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二期 ——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9a)

---

【人物春秋】解读晚年周恩来	胡 平
【千秋功罪】《晚年周恩来》读后断想	芦 笛
【读史随感】周恩来的人生悲剧	王军涛
【各抒己见】周恩来不需要高文谦为之“遮掩”	高振国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侯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人物春秋】

### 解读晚年周恩来

• 胡 平 •

#### 一、评周最难

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

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像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

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份。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像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份，此其一。

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

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着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

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感谢高文谦先生写出这本《晚年周恩来》，为我们解读与评判周恩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谦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由于工作职责之便，高文谦得以披阅大量中共内部的历史文献以及对若干当事人进行采访谈话。八九期间，高文谦带领同事上街游行，热情支持学生运动，还起草公开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当局整肃，虽然被单位领导保护过关，但高文谦从此下定决心和中共专制体制彻底决裂，再不充当御用文人，再不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后来，高文谦来到美国，耗时五载，历经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来》。

二、“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

《晚年周恩来》主要写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写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和林彪的关系，和邓小平的关系；写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专横霸道，奸诈残忍，固然令人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内的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投机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摇头叹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份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么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 and 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

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19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读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读，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有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 三、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

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 四、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试问，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乱臣算反臣吗？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跃进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彭德怀才算忠臣。不过严格说来，彭德怀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因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书只是私下里交给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备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而过去忠臣给皇帝提意见都是在朝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大发雷霆，纠集其追随者对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给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时，彭德怀很快就举手投降，全盘放弃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还签字画押，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们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弃原则的，彭德怀当忠臣但没有当到底，所以我说他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

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

见到君主有不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

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

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 and 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

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 五、另一部份事实

如作者所说，《晚年周恩来》“评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动舞台在高层，所以作者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宫廷，对社会则着墨较少。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在叙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层人物的关系时，作者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较少写他们的共识和一致。这种特定的视角和侧重对写作来说难以避免，无可厚非。读者阅读时务必留意，否则容易产生错觉。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份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

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像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 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

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



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师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师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着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

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

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

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

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能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已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

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着眼泪。”

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 七、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

记得在76年“四五”悼周运动中，一份题为“总理遗言”的传单流传甚广。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可惜只是伪造。

现在我们都清楚，周恩来临终并未留下遗言。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呢？

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

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

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

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

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

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讥，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意于文革、甚至不满意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

□ 原载《北京之春》，2003年8月23日

~~~~~

【千秋功罪】

《晚年周恩来》读后断想

◇ 之一，周恩来是忠还是奸？

据野史载，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害了背疽，按中医理论忌食鹅。不料朱元璋竟然赐蒸鹅一只。徐知道那其实是赐死，心寒到极点，当着“天使”的面，老泪纵横地吃完了那只“天”鹅，当晚便死了。

我当年看到这故事时，心下极度骇然。不料几十年后又读到了让我更为毛发悚然的事：70年代早期，大夫们查出周患了膀胱癌，但尚在早期，可以动手术根治，但毛居然下令不许开刀，而且还不许检查治疗，更不许告诉周本人，导致病情延误，癌症扩散，终不可治。在血尿大量出现后，毛还是不许治疗，连在膀胱内灼烧癌组织都不准。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借检查时抗旨偷偷干了。

这是高文谦着《晚年周恩来》中披露的秘史。记得李志绥也约略提到此事。不过李的解释是，毛缺乏现代知识，认定癌症不可治，开刀有害无益。但李也讲过，他驳斥过毛这一说法，指出乳腺癌的治愈率就很高。毛说，那是因为该类癌生得浅表，容易早期发现，所以不足为训。由此可见，毛完全知道只要发现得早，癌症并非不可治疗。而周的癌症发现时还在早期，大夫们也报告了治疗预后将会很好，毛应该知道那是可以根治的。因此，这完全是有意谋杀。那“不准检查”的命令就最充份不过地暴露了这一点。

和伟大领袖不许好总理治癌症比起来，明太祖真是圣恩浩荡——背疽决不会带来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晚期癌痛。当年王明同志患病住院，被特工趁机注射水银，幸被鬼子大夫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和老周的待遇相比，王明也算得上圣眷甚隆了。

过去十多年内，人民的好总理成了拥共与倒共双方必争的道义制高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来是所谓“德治”。按传统儒家理论，我党如今已经基本丧失统治人民的道德资格（所谓“天命”），当然要死死抓住“周公”这硕果仅存的“圣人”作为自己的“道德锦标”。倒共派也看出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要撕去对方最后一抹遮羞布。记得当年孔捷生为好总理的“私生女”造势，写了篇什么《解咒时代》，其论证方式一目了然：既然能养私生女，当然周公也就不是你们吹的大圣人。

这种“三姑六婆政治学”其实也算不得一大发明。索尔兹伯里在《新皇帝》中就披露过，他去北京采访时，党内有人把毛的私生活丑闻大量泄露给他，目的就是要搞臭毛，以此来打击党内左派。

在这种大背景下，报导和谈论周恩来就很难做到客观公允。然而，高文谦先生最近推出的力作，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但披露了许多像上文提及那种秘史，而且富于真知灼见。最难得的是，作者能像西方作者那样，尽可能从主观立场上超脱出来，对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和一系列环绕他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客观深入的剖析。

既然是传记，当然也就有作者对传者的主观评价。高先生认为，周是个典型大儒，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太深，恪守“君要臣死，不敢不死”君臣之道，抱定了“保持晚节”的愚忠立场，因此明知毛倒行逆施，也不敢犯颜直谏，而是隐忍顺守，因势利导，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加以弥补，缩小灾难规模。但终因治国理念与毛不同，毛直到最后也没放过他，最后无比凄惨地死了。

对此说法，胡平先生表示不同意。他的文章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大意似乎是说，周逢君之恶，当不得“愚忠”。愚忠者不可能助纣为虐。

由此便引出了对传统人物评价必不可免的政治学术语“忠”、“奸”的理解。按传统标准，周恩来到底是忠还是奸？

仔细审视下便能发现这是个钻不出来的死胡同。传统所谓“忠奸”之分，端视臣子心术如何。如果臣子不计宠辱安危，恪守圣贤之道，凡事为君王的长远利益考虑，以圣人规定的君王行为规范来监督主上的行为操守，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哪怕坐牢杀头亦所不惜（所谓“文死谏”），则就是所谓忠臣。一部24史中充满了这种忠臣，从传说中的比干直到明朝的左光斗、杨涟，等等，等等。

同样地，一部24史中也充满了奸臣。这些人为了一己荣华富贵，拼命揣摩上意，拍马讨好，用满足主上私欲来博取其欢心，根本不管这么作会给君王的长期利益带来何种损失，更不管主上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圣贤之道。

有趣的是，用这传统标准来套文革中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大臣——周恩来和林彪——都要遇到困难。周或许确实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但他这么做的个人动机是什么呢？谁都知道，他根本没有个人野心。他的地位已经够高了，根本不想也不敢再往上爬，只满足于做安全的第三把手。他能生存下来也完全是靠这一条，否则以他的资历、声望和出类拔萃的才干，毛早就令人往他的静脉里灌进了两三汽油桶水银，决不会等到最后再来借癌症杀他。所以，根据缺乏作案动机这一条，就足可排除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

既然不是奸臣，根据传统的黑白两分法，似乎就是忠臣了。但周哪有个传统忠臣的样子？“文死谏”在哪里？别说死谏，连活谏或不死不活谏或迷你谏都从来没有过。

如果要评选最懦弱、最不敢批主上逆鳞的“懦臣”冠军，大约非周莫属。记得唐德刚老先生有文道，70年代，他托尼克松访华之福，去大陆访问，蒙好总理接见，短短个把小时内，好总理便说了几十次“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让他为这才干之杰出远超历史上的名相悲从中来。如果连海外来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能窥破他的卑微人生，那些日近龙颜的内臣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李大夫非常鄙视好总理，而且汪东兴也如此。记得李老曾对采访者说，老周根本就没有老邓的气魄，即使死于老毛之后也绝对压不住阵，云云。

不过，这些人其实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看不上老周，主要是他对打手们如江青者逆来顺受，简直到了引起生理恶心的地步。但这正是周的绝顶聪明之处。他不是怕打手们，怕的是打手们背后的主上，知道那超级恶棍什么都做得出来。正如高先生的精譬分析指出的，老邓不知此理，看不透打手其实代表伟大领袖，终于栽在了这上头。但即使如此，老周也实在太怯懦了些。这种委琐卑微的懦臣形像，实在离传统的红脸忠臣太远太远。

林彪则比较符合传统的奸臣概念。他是党史中登峰造极的拍马冠军，远远超过刘少奇、彭真那些无产阶级老马屁家。而且，他这么做有着极为明确的个人野心。该同志早在七千人大会时便看出了毛刘之间的矛盾，用心良苦地反潮流，大赞大颂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果然在四年后种瓜得瓜，成了敬爱的副统帅。文革中，他不择手段诛锄异己如罗瑞卿、贺龙、杨成武等人，其狠毒令人发指。因此，无论从私人动机和行为来讲，他都符合传统意义的奸臣形像。

但立刻又出来个问题。在主上看来，刘少奇对他构成了威胁，必须发动文革来把他搞掉。

林在文革前、文革中掀起个人崇拜以及和毛形成坚定联盟，提供“永远听毛主席指挥”的枪杆子，使毛得以顺利搞掉刘邓司令部。凡此种种，无不极大地巩固了主上的地位，建立了主上的绝对权威，将刘邓等奸臣的“谋反大罪”消解于无形之中。这难道不是忠臣？

连他那个“谋害伟大领袖”的问题也颇费神思。如果此事是真，则按传统的说法，既可解为大逆不道，当诛九族，又可解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是“汤武革命”一类的吊民伐罪。您说该算哪一桩？

如果他没干过这事，只是坐飞机跑外国，则既可解为如共工般逃避天诛，罪该万死，也可解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全身远祸之道，又有什么错的？

所以，如果机械套用传统理论来解释所谓“忠”、“奸”，势必要钻入出不来的死胡同。

我想，高先生从文化传统角度去剖析周的心态，当然很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党文化当然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是传统文化中腐恶部份的集大成者，但它与主流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区别。共党社会远比传统社会反动落后，在我的旧作中，我列举了好几条共党社会不如传统社会的地方，其中有一条是：

“圣贤之道作为最高权威，儒生作为这最高权威的解释人，对暴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时是政教分开的，国家元首只是行政元首，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教主，不可能像伟大导师那样集皇帝与教主为一身，垄断了所有的世俗的与精神上的权威。”

这就是构成周恩来个人悲剧的基本原因，是他根本无法按传统忠臣行事的根本原因。如果他活在传统社会中，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他可以以圣贤的教导来对照君王的举动，随时予以规劝。但新时代的圣教则是毛泽东思想，这赋予了他“臣子”与“教徒”的双重身份。他不仅必须像传统忠臣那样，在政治上忠诚于君王，而且必须作为虔诚的教徒，在思想上忠于伟大教主。这就剥夺了他最起码的独立思考权利，除了奉命唯谨，逆来顺受，我实在想不出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的确，这种黑社会对思想禁锢之严密，实在是让他无路可逃。传统儒家从来相信“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因此，民生状态作为天意的反映，必须始终是天子的注意力焦点，以免民不聊生，引起上天震怒，收回天命，把它转赠给另外一个真命天子。这就为忠臣们提供了一个挟制君王的尚方宝剑。但在他在毛共那种黑朝廷中根本就没有这道德政治资源。毛本人不但是君王，而且更是天命（改名“历史潮流”或“客观规律”）代表者，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要周反抗毛的倒行逆施，等于要这个一生献给那个邪教的虔诚信徒叛教，这可能么？

这就是周干出那些违心造孽事来的基本原因。他何尝不知道贺龙不是叛徒，又何尝不知道刘少奇并非内奸？但那邪教理论规定，为了革命的长久利益，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牺牲。即使是元帅和国家主席，为了“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蒙冤受屈也是应该的。同样地，他当然知道文革破坏国计民生，但为了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人民生活暂时困难些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更何况作为一个老革命，他从来信奉“为了崇高目的，不惜一切下流手段”的教义，终生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里。当年伟大领袖在洛川会议上伙同张闻天，提出借助抗战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伟大战略，引起了他和红军将领们的极大不满。然而正是伟大领袖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下的“联日攻国”，决定了中共革命的最终胜利。如今毛只不过是把阴谋诡计搞到了战友们头上，那又有什么奇怪的？谁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再度证明，从革命的长远利益上来说，毛就

是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在过去已经证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为什么今天就不该坚持下去了呢？

我想，这才是周恩来的悲剧所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民族的悲剧。重要的不是去争论周到底是不是好人，更不是他是否有过私生女那种只有三姑六婆才会关心的烂事，重要的是从这个“本世纪具有罕见才干的政治家”的个人悲剧中，透视出那有史以来第一邪教的荒谬与危害，这才是真正的理性批判。

◇ 之二，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

据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老邓曾说，如果没有总理，则文革带来给国家民族的灾难还要更深重，但他立刻又加上一句：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就不会搞那么长。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将海内外一切颂周和贬周的言论都“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有趣的是，它们说的都是事实。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周，人民的苦难肯定要深重得多，而如果不是周逢君之恶，苦苦撑住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死死箍住随时都会散板的全国政权，老毛根本就没有那个客观条件把整个党国机器砸碎后，又重新组装起来。所以，老邓此说，堪称对周在文革期间的历史功过的全面评价。

针锋相对的政治两极，对同一政治人物作出的评价，却居然能在不同剖面成立。仅此一端，就足见为倒共派与拥共派共同热爱的黑白两分法是何等可笑。

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常常对历史作出虚拟。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假想推理，有时很能说明问题。科研中常用的一个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就是把要研究那个因素除去，再看后果如何。这种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便是种种虚拟文章诸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出现的由来。

我曾经指出过，这种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假设某事件发生（例如上文中“战胜”）或不发生（例如上举“进入中国”）之前，必须确定该事件的不发生（日本战败）或发生（日本侵略中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例如，我认为中共上台完全是一种因各种天缘巧合而发生的偶然事件。所以完全可以作出“如果中共没有上台”的虚拟，以此看出中共统治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又如西安事变后，先总统蒋公被匪徒张学良劫持后放归南京，完全可以撕毁空口无凭的君子协定，在囚禁张少匪后，令何应钦率讨逆军猛攻匪区，毕剿共全功于一役。安内后再按原定战略计划徐图攘外，则中国历史必然全面改观。我甚至就此构思过一部《如果历史这样发生》的政治假想小说。应该说，这种虚拟完全是科学有科学根据的，因为蒋公当时确有作出那种决策的自由。

贬斥周恩来的论者通常使用的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虚拟推理。在指责周“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并列举大量铁的事实加以证明之时，他们其实引入了一个隐含的前提——周有拒绝与毛合作甚至反对毛倒行逆施的主客观可能。

从表面上看，周似乎确有作出这种选择的自由。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8届11中全会，毛与刘邓摊牌，把两人打下去，把他结成政治同盟的林彪抬为接班人，并通过了指导文革的《16条》。此时与会高干们本能地知道烈火行将烧到自己头上，“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普遍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如果周此时挺身而出，和刘邓站在一起并把朱德抬出来，逼毛真正退居二线，封他个党的名誉主席养老，从此结束他对国事的瞎指挥，则取胜不说

有很大把握，应该也有相当可能，因为七千人大会后，毛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已经为全党熟知，而刘邓因为在“困难时期”为毛胡作非为擦屁股而威信空前上升。当此高干人人自危之时，如果刘、周、邓结盟，与毛拼死一搏，即使达不到逼退毛的战略目标，起码也可以保住刘、邓，并利用多数否决毛开展文革的动议。

又如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失宠后。如果周与林秘密结盟，以林可以指挥的枪杆子和周的干部队伍作后盾威胁毛，逼迫毛提前交班，则仍有相当大的胜算。

再如林彪事件后，毛蒙受巨大打击，一度病倒不问政事。此时周之人望空前高涨，在党内跃升二把手，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果从此对毛强项，毛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周也不至于苦于被动抵挡毛放出来的无穷冷箭（“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主义”、批“经验主义”等等），起码用不着天天受四人帮的肮脏气，让那些百无一用的宵小骑在头上，随心所欲拉屎拉尿。

然而周就是什么都没干。不管毛的决定是何等违反他的理智判断和良知，不管他明知刘少奇那“叛徒内奸工贼”是何等冤屈，贺龙“叛变”又是何等子虚乌有，他依然在迫害那些人的文件上签名赞同，从此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就连他自己的义女孙维世被迫害惨死，他都懦弱到不敢施以援手、略加呵护的地步！有长辈如此，不如无有！仅此一端，周氏死后也就只能焚骨扬灰。如此“大儒”，何颜以见地下祖宗？！

最可悲的是，哪怕如此伏低做小，逆来顺受，百依百顺，唾面自干，也没换来毛的宽大处理。待到大乱初歇，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榨取得差不多之时，毛便鸟尽藏弓、兔死烹狗，不准手术于前，罗织入罪于后，不但准备利用毫不成立、毛自己也宣布过一风吹的“伍豪自首启事”把他往死里整，把早成陈谷子烂芝麻的“宁都事件”又当作法宝祭出来，甚至以谈判中美军事合作为借口，诬他为“投降派”……。

周终于给逼到了地狱的入口处，下一步是什么阴森森的场景，再比他迟钝百倍的人也想得出来。当医护人员要跟他合影时，他苦笑道：“合影没问题，不过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可见他对即将到来的“鞭尸”，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

在生命即将熄灭之际，周终于反抗了，他抓住手术室的门，微弱而绝望地喊道：“我不是投降派!!!”几十年后读到高先生的书时，这柔弱的抗议仍然透过历史的长隧传来，在我耳畔轰轰回响，让我毛骨悚然。这微弱的呼唤和亿万民众的呻吟混合在一起，在我眼前生动再现了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无从描写、不可思议的血腥、罪恶与荒唐。

所以，不管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从无数冤死狱中的战友的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周都应该而且能够反抗毛，但他就是俯首贴耳，听任毛的宰割，为大屠夫殷勤操刀，却不但不但在人肉的筵席里分到一杯羹，就连自己都险些化作了那盛宴中的一道大菜。

这么说，贬周派是对的？但林彪又怎么说？

与周那给彻底抽去脊梁骨的儒相不同，林彪据说是唯一敢不服从毛的瞎指挥的悍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毛欺骗出卖、冤枉挨整后，拒绝作自我批评，在五一集会上根本不与毛打招呼，露了一面便悻悻而去。但在毛的鬼头刀高高举起，行将砍下来之际，他又做了些什么？抵抗了么？

一般人总是不明白，百战百胜、曾经统帅过百万大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被索尔



兹伯里誉为“中共最杰出的天才将领”的林彪元帅，在困兽犹斗之时，为何竟然那么优柔寡断，谋而无断，最后只能仓惶去国，还去而复返，最后葬身大漠，死后还“头颅行万里”，被切下来远送莫斯科，甚至被老毛子用高压锅煮去腐烂的头皮肌肤……

这些人没看到，林彪根本没有与毛决一雌雄的资本。他是率领过百万大军，但那并不是他的私人军队，而是“向太阳”的“我们的队伍”。他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完全是靠无耻吹捧毛换来的。倘若他真的想扯旗造反，则通电一出，恐怕连贴身卫队都要造反，当场就把他擒拿归案，献俘帝阙。奢谈什么“到广州武力割据，联合苏联，南北夹击”，完全是吗啡打多了弄出来的谰语。“一条是坐牢，一条是从容就义”才是他面临的仅有“选择”。

所以，毛根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无论是高饶、是彭黄张周、是彭罗陆杨，是刘邓陶，是林黄吴李邱，还是人民的好总理，统统在伟大领袖面前不堪一击。

我已经在另文说过，毛和历史上的暴君有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实行的其实是“三权分立”，也就是“天命，圣人言，君权”。在理论上，“天命”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道其次，最后是君权。

如今蓄意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擅长的，便是抓住儒家特别是孟子的零言碎语，硬要说儒家文化含有民主思想或“民本主义”成份。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这更违背事实、更强奸古人的谬说了。

如果我们用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整理透视儒家典籍，立刻就能看出，那学说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鼓吹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绝对臣服关系，从来没有过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它的社会理想不是物质繁荣，更不是个性解放或全民获得同等政治权利，而是和谐。所谓和谐则通过臣民对君王、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来实现，而君王、父母、丈夫则应该清心寡欲，仁厚宽和地对待社会等级比自己低的人。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理想境界。

很明显，要指望君王靠自身的道德修养去节用爱民，完全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主张。圣贤们尽管愚蠢，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发明出“天命”一说来适当震慑在政治实践中至高无上的君王。

照《书经》的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用现代语言来破解，那意思就是，君王是上天授命君临万民的“天子”（所谓“奉天承运”），而民生状态其实是反映“天命”的镜子，如果民不聊生，则上天必将震怒，先是通过一系列自然灾害特别是彗星、地震等“天象示警”，此时君王就要赶快下“罪己诏”，向老天爷作出沉痛检讨，并减膳撤乐，采用积极措施救济灾民，并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息。如果昏君执迷不悟，则上天就要考虑改换接班人，把天命转移到某个“真命天子”（例如现代“民运王”就是这样的“潜龙”）头上去，于是战乱四起，直到那个“真命天子”扫荡了群雄，坐上了龙廷。这种“唯天史观”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也确实圆满了解释了以往历史发展。

另外一个约束君王行为规范的是圣贤之道，而儒生便是“圣人言”的解释人。在实践中，它确实也能起到微弱的约束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这种约束完全以“苦谏”的柔弱方式进行，对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主（如汉武帝）而言，那不过是以稻草勒惊马，白白搭上许多脑袋或睾丸。对于懦弱自私的庸主如明神宗而言，“清流”们的反复聒噪会激起皇帝巨大的反感，由此竟然导致皇帝甩手不干，罢工几十年。

但不管怎么说，这“三权分立”至少还给了正直的臣子们行动指南和与君王抗争的道义资格。这就是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忠臣”的原因。不管这些人行为的客观效应如何，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他们确实是一种光辉的道德榜样。

然而在毛共社会中，就连这可怜的、效果极成问题的“三权分立”都没有了。毛不但代表“天命”（即“客观规律”或“历史潮流”），甚至在林副的造神运动中被捧到了上帝的位置，而且他本人就是新时代的圣贤，语录就是现代“圣人言”，还是“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表者，再加上世俗君王的现实地位，这样的“四个代表”，绝对是排山倒海压倒一切教徒和草民不可抵抗的力量，在他面前，不管地位有多高，任何人都失去了抵抗的道义资格和理论依据。

正因为此，就算为毛先后打倒的所有政敌早早看出了他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起来和他作殊死一搏，那又怎么样？邓小平在他死后都不敢彻底否定他的形像，那原因再简单不过：推倒了毛，我党往哪里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还在那里？打倒毛就等于打倒共党，否定整个中共革命，最终导致否定他们自己。这里面利害攸关，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不可能看出来。这就是他们含冤受屈、至死不叛、相忍为党的根本原因。周恩来在林彪死后放声大哭，不能自己，就是悟出了这惊天丑闻一定会在他苦心维护的毛（=党=中共革命）的形像上戳个大窟窿。的确，就连罗点点那样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后也悟出了中共革命的荒谬，并且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解放”后，在文革中，周恩来其实什么都没做错。高先生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认为他是个精明的投机家，从不和失败者站在一边，这其实只是皮相之见。以周的绝顶聪明，他早就看出了毛是不可抵抗不可战胜的，永远只会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与其和刘邓等人同归于尽，不如隐忍顺守，因势利导，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缩小灾难规模。

读到这里，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看出一切都是那万恶的制度造成的，是那种制度造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话当然不错，但问题是，这制度是怎么在中国确立起来的？

在我看来，周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此，是他本人和那些后来被革命吞噬的战友一道，在毛的率领下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亲手在祖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最集权的制度。在这过程中，他洒下的每一滴热汗，耗去的每一滴脑汁，其实都是在为后来的大悲剧作点点滴滴的铺垫。他那革命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为自己、为战友、为民族挖掘坟墓。

悲剧更在于周并不是坏人。与毛不同，他没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生活也不奢侈腐化。和千千万万的真正志士一样，他当年投身革命，为的是改造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繁荣、民主、自由的国家。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我实在找不出那有什么不对之处。

但问题是，和许多国人一样，他错误地认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而要暴力革命能够成功，最起码的前提当然是把一切权力、一切世俗的、精神上的乃至道义上的权威，都集中在革命政党特别是革命领袖身上。当一个事业的“正义性”人格化以后，那个代表“正义”的领袖便成了天命附体的“真命天子”，人民便会为之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之死无悔，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史诗，创造出一桩桩人间奇迹来。在此之后还要让他拆毁亲手建造的神龛，告诉人民那“天命代表、民意代表、圣教教主兼世俗君王”不过是个超级流氓，岂非痴人说梦？

所以，周的致命错误是在投身共产革命那一瞬间就犯下了的，以后的错误不过是那最初错

误的逻辑延伸。周的一生是南辕北辙的错误的一生，大前提错了，便真是圣人也只可能作恶。

可悲的是，这种错误至今还在轰轰烈烈地延续。如今那些主张以暴力推翻共党，改造中国的“民运人士”，除了帝王思想严重的“民运王”之类的坏人以外，真正的志士不过是在重蹈周的覆辙而已。可笑的是，他们一边踏着先烈的脚印走，一边还自以为有那智力上的权利去对周品头凭足！

在我看来，这才是周代表着的全民族悲剧。真正的悲剧是那种永不落幕，反复上演，观者观之不厌，演者全心投入的闹剧。暴力革命就是这种把戏。

~~~~~

## 【读史随感】

### 周恩来的人生悲剧

• 王军涛 •

毛泽东与周恩来情结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特有的政治心理，这不仅沉淀着我们历史上一段痛苦的政治经历，而且蕴涵着我们的反思和对我国发展方向的期待。王若水先生去世前，我去看过他三次。他与我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周毛关系。高文谦的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线索和启示。当这两个巨人离开四分之一世纪后，中国官方仍然禁止讨论，甚至打压书的出版，这表明弄清这段历史真相是多么重要。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书稿就支持出版这本书的原因。在此，我谈几点自己的心得。

第一，中国人如此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残酷的体制中。过去，许多人认为，下层百姓很苦，温饱不能保障，还要受各种运动的折磨。现在，通过这本书我们认识到，那些享有特权的上层官员也很苦，在权力斗争中没有任何安全可言。这样一个除毛泽东之外的人都没有幸福的黑暗制度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什么导弹、原子弹和经济发展，都不能成为这类灾难的存在理由。我们由此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过去整人的共产党高官在文革后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可惜的是，邓小平虽然允许对文革进行了有限的讨论和揭露，但没有将这段痛苦经验变为制度性总结，建立民主和法制，而是转向唯经济论，并且压制制度变革的讨论和实验。其后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江泽民在十六大权力交接时重演某些毛的错误。特别是他那种专制体制中一把手的狭隘妒忌心理，在排挤其他领导人时表现得与当年毛泽东整周恩来如出一辙。中国人不知还要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代价才能真正在制度上根本杜绝这类悲剧。

第二，对周恩来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认为，当然根据天理良心进行简单清楚的评价，而且这会对后世的中国政治建设产生积极的政治功能，因为这样可以警醒后世高官，不得重犯这类错误。如秦桧在西湖边上一跪千年，所有想当汉奸者都要踌躇。其实，秦桧的故事并不象今天民间流传的那样简单。秦桧是状元出身，也追随二帝在金国吃尽苦头。主张“和议”从那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民心分析，都有理由。但秦桧还是跪在西湖边上的岳飞墓前，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人心的重要条件。根据此论点，历史人物的真实评价并不那么重要，评价的心理和文化效果更重要。如果周恩来的忠义思想是维护罪恶体制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故事简单化为通俗易懂的大奸大恶，这样可以加大今后有人想助纣为虐的心理负担成本，从而避免出现这类政治人格导致的悲剧。这大概就是中国儒家重视修史的理由。

然而，评价周恩来与秦桧不同。民间已经认定秦桧是大奸，但对周恩来却有不同寻常的好评。即使为后世立规矩，我们也必须认真梳理评价及理由；否则，不仅不能服众，而且会引起

更坏的效果。如果客观评价周，我同意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周的问题其实是毛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君王都是暴君；如果周遇上唐太宗或汉高祖，他也许就是一代贤相，没有严重问题，更不会有罪。由此可见，周的问题变为，他为什么要助纣为虐？我想，他不愿出局，想影响历史；这里有个人抱负，也有他以为他比别人能更好把握局势。此外，毛是暴君，但不是荒淫无度的昏君；这使周认为自己还有影响他的机会和可能。

如果看待和评价周仅仅这样看，仅仅看毛周关系，就无法得出对周恩来的完整评价，因为在毛的权力场中，周的问题太严重，对周只能争论他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我们应当跳出毛的决策这个领域之外看周，看他勤政为民和与同事相处的情况。这样评价，才不会简单。不过，这应当是另外的史料和研究著作的任务。例如，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论多么反共，都对周留有余地。我与高文谦先生去见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剑桥中国史文革卷主编麦克法夸尔先生时发现，高先生书中的事实他都知道，但他仍对周有好评。

第三，周恩来究竟给我们个人留下什么启示？读过《晚年周恩来》，我认为，此书对人们原来对周恩来的看法的影响不大。原来同情和喜爱周的会扼腕长叹：总理比我们想得还要苦许多，太惨了。原来瞧不起或恨周的人会说：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下贱。那些对此事没有感情投入的会以为：周的一生真窝囊，不值得。其实，周恩来能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是他个人悲剧的启示。我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周选择毛，而且将其定位于现代君臣关系？周不是怕死之辈，也不是无德之人，更不是封建遗老遗少。他是五四运动和共产党激进革命的儿子。显然，他的选择是自觉的精心取舍选择。有人认为这是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社会化的结果，是现实逼得那些想影响历史的人选择这样的组织合作体制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机会。我们应当探讨那些决定性转折关头的行动困境以及选择的考量；不这样，就无法准确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也不能吸取真正的教训。简单的道义评价，会使我们错失总结教训的良机；我们会认为，周恩来是坏人，他自然是坏人选择坏事，他不过比其他坏人更狡猾；这样，我们在面临类似困境时仍然作出类似周的选择，会以其是周当年的、但我们今天没有考虑过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从而国家重蹈历史覆辙，个人重演历史悲剧。只有再现那些困难情境，我们才能警惕不再作出周的选择。

我在民运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坚定战士，他们勇敢坚定地推进运动，并且希望有更鲜明、激烈、简单、彻底和更有效的行动。面对他们这样的文化心态，我常常想，毛泽东、周恩来那代人不是一路沿着这样的心路历程走过来的？要知道，湘江之畔、桔子洲头的热血青年变为阴毒的暴君；南开校园、巴黎街头的理想主义者变为驯服的奴仆，其背后一定有许多艰辛经验和痛苦思考。我们不一定比他们更圣洁和高尚无私；如果我们能在类似困境中作出比他们更好的选择，走不同的心路历程，最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

最后，我想对执政党说几句话。我不认同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江山中也没有利益，本来犯不上关心共产党及其成员的命运。但读过高先生告诉我们的周恩来的悲剧，我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最为之感到悲哀的不是周恩来，他毕竟风光一生，死后哀荣还可能超越共产党的政治生命，甚至可能进入民族政治史的贤良祠。我最悲哀的是那些成千上万的烈士。他们投身革命时无私无畏，献出生命，最后却为毛泽东的昏庸戏搭了台。现在还活着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共产党员回首一生，会感到竟然为这样的江山服务，真是白活一场。今天，如果江泽民和其他高层领导又蹈历史覆辙，那么，现在为共产党工作的人将会无颜以对历史。所以，当某些朋友劝我不要卷入出版这本书时，我说，最应当支持出版这本书的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只有吸取这本书中的政治教训，只有避免再出现象毛泽东这样的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和阴谋弄权的一把手，中共才能对死难烈士和活着的党员、对历史有个基本交代。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始改革政治体制，将周恩来所代表的共产党的悲剧教训化为制度建设的总结。

~~~~~

## 【各抒己见】

### 周恩来不需要高文谦为之“遮掩”

• 高振国 •

高文谦先生可算得上中国史学界最幸福的人了，从事史学工作，能位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还有什么比这崇高的呢？千思万想也没想到像先生这样的史学家也在“夹缝”中生活，不能以史家的风范直言。只能“根据政治上的需要，总是想方设法试图替周遮掩，找解释，实际上心里很清楚。”听此言，使我明白了文谦先生的升迁方式。悲呀！这就是当前整个官僚世界腐败的根源之一：只以言——所谓跟中央保持一致——取人的典型表现。

史学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都是些大朴大真大愚的圣人，心中全是公正、真实、正义，完全不考虑个人生死得失。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吧，读过他的《报任安书》吧，他虽没有像齐太史兄弟先后被杀头，但他是保住了“上头”，割去了“下头”呀，那比砍头还要难忍千百倍呀。前三史的作者司马迁、班固、范曄，都是被杀被残的呀，还有东汉末的蔡邕，还是被王允杀的呢。在今天看来这些人统统是傻子，可怜虫。他们都是中国史学界的光辉典范呀，文谦先生，即使不能像先贤这样壮烈，也完全没有必要在“夹缝”中去为周恩来“遮掩”呀！周恩来需要“遮掩”么？他一天到晚责备自己，还需要史家“遮掩”？我看是你自己需要遮掩。

史学工作者本应是整个社会中最忠诚的人，在这个队伍中的顶尖人物——您，文谦先生都要靠“遮掩”才能生活，其它行当还有什么说的呢！？怪不得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生出了这么多高级贪官。今天我真的明白了，当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公然不诚实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就开始腐败了。这样的人一旦担任要职，机会来临，就会干出腐败的事情。

悲呀，这就是咱们中国官员腐败的根源之一呀，党中央应该正视以言取人的严重后果。

文谦先生宣称自己今天的使命就是“去伪存真，讲出真话，还原历史”，好！佩服。我也说几句真话。

先生说：“我在86年《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尽管是为周说了不少好话，还是引起很大的批评。记得有人找上门来，和我辩论，他们认为我写的周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形像，周应该是敢于与毛赤手空拳搏斗的英雄。我说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应该根据历史事实说话。”这样的说辞在美国可能有人会相信，可是到中国去讲，肯定会引起哄堂大笑。可以断言，凡是稍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去想周恩来，他是武松？他是泰森？周恩来一辈子温文尔雅，不要说同毛泽东，就是同蒋介石他也不会赤手空拳搏斗呀！我想敢上门去与先生辩论的人，肯定是某高层人物，普通老百姓决不会、也决不可能、也决不敢去登门辩论。

说真的，周恩来绝不需要先生为之说好话，连半句都不需要。本人虽然卑微不足挂齿，但也曾在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华北平原徒步走访过，凡谈到周总理时，没有一个人说这人“复杂”、这人“愚忠”，什么“不讳过，不苛责”，都是打心里敬佩，滴着泪花，“好人……好人……好人”！“四人帮”倒台，郭兰英唱歌，一唱出“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你一心为人民，人民热爱您。”她也唱不成腔了，人们也听不下去了，强忍不住只得抽泣。这到底说了什么了不起的颂辞呢？什么也没有！我从来也没有读过你的“遮掩”式的“说好话”式的文章！当我向人们讲周总理的事情时，99%都是讲几句就哽咽住了，讲不出话来。

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千言万语也难说清。但是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感天动地泣鬼神！”不要以为周恩来愚，他是真正的大智大勇，是它的灵魂激励着千千万万人们扫荡着毛泽东晚年之后产生的极其荒谬的乌云。君不信？请想想1976年四月五日前后天安门战歌花环铺成的海洋，垒起的山岳！人类有史几千年，何时有过？这是不是周恩来的力量？这样的人何须“遮掩”，何须“诿过”！

文谦先生，周恩来的档案固然重要，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中国人民。先生不是立志“还国人知情权”么，那就请回国面对人民。

先生大作《晚年周恩来》封面上有字曰：

遍访高层的知情人物，公开官方的核心档案，颠覆流传的历史定论  
高文谦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

真可谓言简意赅，气势夺人。既然决心颠覆流传的历史定论，那就不能不回到流传定论的地方，去肃清那里的影响，让那里的人们“吸取经验教训”，须知那里有十三亿人呀！我盼望着您新的大作《周恩来全传》早日问世，到那时，最好将“曾任”二字去掉，不是更加权威！

祝高文谦先生一切顺利！  
谢谢，对不起。

□ 作者自注：中国旅美探亲者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